

中国小说史丛书

宋元小说史

萧相恺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萧欣桥

封面设计 凌瑛如 刘 炜

宋元小说史 萧相恺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印数 0001—5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18-372-4/I·237 定 价：17.50 元

“中国小说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问	刘世德	邓绍基	林 辰	袁世硕	章培恒
主编	安平秋	侯忠义	萧欣桥		
编委	宁宗一	安平秋	齐裕焜	张 俊	杨 忠
	陈美林	陈庆惠	欧阳健	侯忠义	曹亦冰
	黄 霖	萧欣桥	萧相恺		

前 言

“中国小说史丛书”是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倡导和支持的一套学术丛书。全国数十位古代小说研究者参与了这套丛书的酝酿、策划、论证和撰写。丛书共十八种，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为断代史，计六种：汉魏六朝小说史（王枝忠著）；隋唐五代小说史（侯忠义著）；宋元小说史（萧相恺著）；明代小说史（齐裕焜著）；清代小说史（张俊著）；晚清小说史（欧阳健著）。第二单元为题材史，计四种：历史小说史（陈熙中著）；世情小说史（向楷著）；神怪小说史（林辰著）；侠义公案小说史（曹亦冰著）。第三单元为体裁史，计四种：笔记小说史（苗壮著）；传奇小说史（薛洪勣著）；话本小说史（萧欣桥等著）；章回小说史（陈美林等著）。第四单元为通史类，计四种：中国小说理论史（王汝梅著）；中国小说文化史（黄清泉等著）；中国小说艺术史（宁宗一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史（黄霖等著）。断代史以史为经，以作品为纬，经纬结合，力求概括某一时代小说史的全貌；题材史、体裁史重在阐述某一题材进入小说创作领域的次第及其在整个小说创作中的比重和地位，或某一体裁的兴盛衰

落的全过程及其特征和变化；通史类旨在揭示和探索其发展脉络和规律。通过以上多角度、多侧面、分门别类、纵横交错地研究，希冀把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鲁迅、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胡士莹、谭正璧等前辈学者有筚路蓝缕之功，五十、六十年代不少研究者有继续开拓之劳，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本丛书旨在对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开拓和创新，进一步推进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孕育、催生出一部划时代的《中国小说史》的伟著来。

本丛书在酝酿、规划中，虽也注意到丛书自身的协调和一致，诸如断代史之间的相互衔接，断代史、题材史、体裁史之间论题重合与交叉时应各有侧重和相互照应，但在各自撰述中有时仍会出现材料的交叉运用和观点的不尽相同，这有的是无法避免的，有的或许更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最后，向支持本丛书的国家教委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和接受本丛书出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以及关心、支持本丛书的学术界同仁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国小说史丛书”编委会

1997年6月

目 录

卷头语·····	1
----------	---

上编 市人小说

第一章 宋元市人小说概述·····	7
-------------------	---

第二章 “说话”伎艺的发展与繁荣·····	10
-----------------------	----

第一节 “说话”的渊源·····	10
------------------	----

第二节 宋“说话”伎艺的繁荣及其多元因素·····	27
---------------------------	----

第三节 “说话”的家数体制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	34
------------------------------	----

第三章 “讲史”类市人小说·····	44
--------------------	----

第一节 概说·····	44
-------------	----

第二节 《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平话》·····	52
--------------------------	----

第三节 《前汉书平话续集》和《秦并六国平话》·····	63
-----------------------------	----

第四节 《武王伐纣书》和《乐毅图齐七国春秋 平话后集》·····	74
-------------------------------------	----

第五节 《宣和遗事》·····	84
-----------------	----

第六节 “讲史”市人小说的历史地位·····	93
------------------------	----

第四章 “小说”类市人小说·····	100
--------------------	-----

第一节 概说·····	100
-------------	-----

第二节 烟粉与传奇·····	104
----------------	-----

第三节 灵怪与神仙·····	120
----------------	-----

第四节 公案·····	131
-------------	-----

第五节 朴刀、杆棒及其他·····	143
第五章 “说经”的予遗及其演变·····	151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153
第二节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及其他·····	159

下编 文言小说

第六章 宋元文言小说概述·····	164
第七章 宋元的志怪小说·····	166
第一节 北宋的志怪小说·····	167
一 徐鉉《稽神录》与吴淑《江淮异人录》·····	167
二 张君房、钱易等人及其作品·····	173
三 《括异志》《青琐高议》《云斋广录》 等书中的志怪小说·····	178
第二节 南宋的志怪小说·····	189
一 何薳、马纯等人的志怪小说·····	190
二 王明清、郭彖等人的志怪小说·····	193
三 洪迈的《夷坚志》·····	202
四 《鬼董》及其他志怪小说·····	215
第三节 金元的志怪小说·····	220
一 金代的志怪小说·····	220
二 元代的志怪小说·····	222
第八章 宋元的轶事小说·····	227
第一节 北宋的轶事小说·····	228
一 北宋初期的轶事小说·····	228
二 北宋中后期的轶事小说·····	236
第二节 南宋的轶事小说·····	260
一 绍兴中前期的轶事小说·····	260
二 绍兴中期以后的轶事小说·····	282

第三节 元代轶事小说·····	311
一 由宋入元的轶事小说·····	311
二 元代后期的轶事小说·····	317
第九章 宋元的传奇小说·····	330
第一节 北宋的传奇小说·····	331
一 北宋前期的传奇小说·····	331
二 北宋中后期的传奇小说·····	336
第二节 南宋的传奇小说·····	350
一 传奇小说的再度衰微·····	350
二 传奇小说的市人小说化·····	354
三 罗烨的《醉翁谈录》·····	357
第三节 元代的传奇小说·····	360
一 《李师师外传》·····	361
二 《娇红记》·····	364
后记·····	367

卷 头 语

当历史的长河流泻至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生活习俗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植于社会、文化土壤中的小说，也随着这种变化以及自身的发育成长规律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飞跃。

一是滥觞于唐的“市人小说”不断发展壮大，终于蔚成大观。于是，雅小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言小说，与俗小说，也即通俗小说，开始明显分流。而且，俗小说逐渐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并终于成为主流。

二是“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的唐人传奇相对衰落，但传奇的主要精神，它的那种对故事、人物及场景交待描绘详尽细腻的艺术特色，却为“市人小说”继承和充分发扬；而宋元的传奇作家则又反过来从新兴的市人小说中汲取营养，传奇出现了市人小说化的倾向。这种市人小说化的传奇，到明初终于又发展成熟，使得中国小说史上出现了传奇发展的第二个高潮。传奇虽然相对衰落，但笔记小说却依然顽强地发展着，不仅数量庞大，且每有可观的篇章。过去的小说史家常常拿它们与唐传奇相比，认为它质直少文，写小说史时，总是一笔带过，这实在是一种误会。传奇与笔记小说乃是文言小说中两种不同的体裁，传奇以缠绵委蛇为特点，笔记小说（志怪、轶事）则以凝练朴实为风格。如果我们拿宋元的笔记小说与唐人的笔记小说相比较，则可看出

它并不逊色，若拿它们与六朝笔记小说比，便又可看出它们的发展来。

宋元时代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是小说走向平民化、世俗化的时代，是小说进一步成为一种综合文学的时代，是小说由丛残琐语的短书向长篇过渡的时代。而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则主要是由崛起于市井之间，“以俚语著书”，与传统的雅小说截然不同的新兴俗小说——市人小说决定的。这批小说在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被称之为“话本”。所谓“话本”，鲁迅先生以为，即“说话人”据以讲说的底本。以后，虽或有人对“话本”的定义作过补充论说，但其作为“说话人”讲说底本的含义却始终没有改变。近年，日本学者增田涉却指出，用“话本”——“说话人”讲说的底本——来概括这批小说缺乏科学依据，很不妥当。他是在对从宋元到明清间几乎所有史籍中出现过的“话本”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全面系统考释后作出这个结论的。他发现，除了在极个别的史籍中，“话本”一词尚可解释作“说话人”据以讲说的底本之外，其余地方，用这种定义去规范这一概念都不通顺，在绝大多数史籍中，“话本”一词，只含有伎艺性故事或故事原本材料的意思^①。他的观点颇有影响，尤其在港台和国外，有些学者，如美国的韩南等，已开始使用“白话短篇小说”来取代“话本”、“拟话本”概念。多数学者虽以为得持一种较为慎重的态度，在没有找到一个更妥当的概念来替代它之前，不得不沿用它，但对用“话本”来称代宋元间繁盛的这批新小说，却也几乎一致地认为是不够妥当、不够科学。

用“话本”称代宋元间繁盛的新小说既然不妥，因此，在这部《宋元小说史》中，笔者拟用“市人小说”一词，来取代自鲁迅先生以来，学术界习用的“话本”这一概念，作为对所有直接

由“说话”伎艺而来，以说散为主体的书面文学的专门名称。

“市人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徧鹊”，字上声。予令座客任道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尝于上都斋会设此，有一秀才，甚赏某呼‘扁’字与‘徧’同声，云世人皆误。”

宋高承《事物纪原》中也说：

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者。

段成式所记之“市人小说”，是杂戏中的一种伎艺，讲的大约是神医扁鹊的故事；高承说市人有谈三国者，讲说三国，当然也是市人小说的一种。“市人小说”这种伎艺，在唐代也有称“人（民）间小说”、称“言话”或“说话”的。入宋之后，一般都叫“说话”，元以后又称“评话”，入清则又多称“说书”，这是一脉相承的一种伎艺。

繁盛于宋元间的这一种伎艺，有几个十分明显的本质特征：

第一，是它的鲜明的平民性。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思想内容的平民化。“说话”既诞生于市井，其作者多市井细民及下层文人，其听众又多平民，尤其是市井细民（它的进入宫廷、贵家乃是它兴盛后的事，相对而言，也是偶然的，短时期的），因此，它必然要着上平民、尤其是市井细民的色彩，反映平民、尤其是市井细民的愿望和情趣，也就是说，它要“为市井细民写心”（鲁迅语）。其次是语言等表现因素的通俗化。在那个时代，平民多没文化或文化水平不高，典雅的书面语言（文言）是贵族、

地主等少数人表情达意的工具,对于大多数平民来说,无疑诘屈聱牙、艰深难懂,无论从作者,还是从其服务对象说,自不适合也不可能单一地使用这种语言,于是,通行的口语(白话)便开始进入了文学艺术的殿堂。思想内容的平民化,语言因素的通俗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第二,是它的较强的娱乐性。“说话”本为适应市民业余生活所需而生,听众在紧张的劳作之余到勾栏瓦肆中去听“说话”,当然不是单为去接受训诫,他们需要放松,需要娱乐。体现在市人小说中的那种曲折的情节,那种风趣的逗乐,那种惨烈恐怖气氛的渲染等等,便是这种娱乐性的实证。这并不是说市人小说不寓劝惩,而是说,它与宗教宣传(如和尚的俗讲)和一般的雅小说相比,更显出一种寓教于乐的特点。

第三,是它的极强的商品性。“说话”本孕育于杂戏之中,杂戏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示出商品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杂戏脱离对王宫、贵族的依附而独立出来以后,则更其鲜明。有人以为,唐代和尚的“俗讲”对“说话”的产生有极大影响,就是这种“俗讲”,也带有极强烈的商业功利色彩。日本沙门圆珍所撰《佛说观音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就说“……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元人胡三省也说:“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说话”这门伎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是一种精神商品:听众付出一定酬劳,以换取精神的愉悦与寄托;艺人凭着这门伎艺,收取一定的报酬,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第四,是它的思想内容与审美意识的世代累积性。同一题材,师徒相授,甲讲了乙讲,唐时的艺人讲过,宋时、元时的艺人继续讲。关于这一点,“说话”中的“讲史”一支尤其明显:三

国的题材，据文献记载，至少从宋仁宗时代起，便有艺人讲说，历经南宋至元，许多艺人仍在讲。到罗贯中编撰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艺人们还在讲，直至现在。

在这四个特征中，商品性是“说话”的最为基本的一个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说话”的平民性、娱乐性乃至世代累积性特点，都是由它决定的。艺人的强烈的商品意识，使得他们着意揣摩其主要服务对象——平民、尤其是市井细民的文化素养、文化心理、审美习性、思想愿望，以期赢得更多人的欢迎，赚得更多的钱财。艺人的这种商品意识，一方面使得他们的作品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较多的进步因素和较新的表现方式，使得他们在竞争中不断开拓题材（从历史到当代，从“说经”到“小说”，“小说”又有灵怪、烟粉、传奇、公案之分），提高艺术，因而繁荣了“说话”，致使宋元“说话”业中产生了许多精品，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一方面也使得他们的作品由于强烈的商业功利色彩，过分地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导致艺人主体意识的削弱，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倾向。

直接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市人小说，理所当然地也具备着这四大本质特征。于小说之上而着一“市人”，清楚地显示了艺人的出身；“市”是交易的场所，又显示出这种伎艺诞生的地方，还可以使人联想起艺人把它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蕴含。市人所创作的作品，当然要带上市民的色彩，要表达市民的愿望与情趣，名称本身已揭示了内容的思想意向。将这批小说直称作“市人小说”，既显示了这些小说的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又有可靠的历史依据；既能区别于一般的白话小说，又恰与现代的所谓小说重合，比起称之为“话本”或白话小说无疑科学得多。

中国的小说发展到宋元时代，明显地开始了雅俗分流，已如

上述。雅、俗两类小说，乃是两种各具特点，有着不同发展线索、发展规律、发展原因，并有着不同的理论指导的小说。宋元小说的历史，正是由这样两种不同小说的发展历史共同构成的。根据宋元小说历史的这种特点，这部《宋元小说史》将力图反映出雅、俗两类不同性质小说在宋元间相互渗透融合，共同激扬前行，它们与相邻的其他文学尤其是戏曲间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特点；描绘出它们各自发展的历史线索以及这种发展的历史契机，以期达到明晰地勾勒出宋元这一历史阶段整个小说发展的历史轮廓和历史原由；在确立宋元雅、俗两类小说在各自发展长河中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确立整个宋元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并于较为准确地确定宋元时代这两类小说重要作家作品在宋元小说坐标系中的位置的同时，进而确定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位置。

① 详见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汉语译文原载1981年台北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第三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期《古典文学知识》曾予摘要转载）及拙著《宋元小说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论》（南京出版社1994年《中国古典通俗小说史论》第50—52页）。

② 《通鉴·唐纪》五十九“俗讲”注。

上编 市人小说

第一章 宋元市人小说概述

市人小说肇源于“说话”。“说话”孕育于早期的“百戏”之中，至唐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伎艺。五代期间，战乱不息，文学遭逢厄运，艺术尤被破坏，“说话”的发展也暂处停滞状态。入宋，它又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市人小说滥觞于唐，至宋而逐渐繁荣兴盛，进入高峰。

市人小说在宋元这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北宋仁宗以前为复苏期，现存的文献对这一阶段的市人小说和“说话”未留下多少记载，只在高承的《事物纪原》中，记有“市人有能谈《三国》者”的事；仁宗至徽宗之间为其发展期，经过一百六十年的休养生息，北宋王朝的经济得以恢复发展，“说话”伎艺随同各种文学艺术事业一起，也逐渐繁荣起来，虽文本实证——市人小说留存甚稀，而文献记载日渐增多。苏东坡《东坡志林》中载有里巷小儿顽劣，父母给钱，令听说“三国”之事。《东京梦华录》中不仅有“说话”分门的记载，且谓有专门说“三分”、《五代史》的艺人，故后来明人郎瑛《七修类稿》中有“小说起于宋仁宗”之说；靖康之乱，高宗南渡，北方沦入战火兵燹之中，江南半壁，河山依旧。随着北方经济、文化实力的南

迁，杭州等江南都市且有畸形的发展，以至时人有“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之叹，“说话”伎艺，在“歌舞升平”之中，于北宋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终于达到了高峰，不但文献记载日多，文本留存也颇丰；蒙古人入主中国，“说话”伎艺又从高峰降落，直到元末明初，一些文人对它进行反思，进行总结整理，再创作出长篇通俗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才又开辟出一个新的天地。

宋元市人小说的发展，虽约略可分为上述四个阶段，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湮没，现存的“小说”类市人小说，又多经后人的润色加工，因此，很难准确判定它们之中大多数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而“市人小说”的世代累积型特点，一方面更给这种判定工作增添了困难，一方面也使这种判定失去了固有的意义，因为具体到某一篇市人小说，它的创作时间实际上都是一个不定数——产生于宋仁宗时的某种“说话”，到宋高宗，甚至到宋度宗时可能仍在讲说，而每一个“说话人”的每一次讲说，又可能都是一次再创作，直到最后固定在文本上，你能说它出于仁宗时代，还是出于高宗、度宗时代？

“说话”发展到宋元这个历史阶段，早就出现了相对独立的家门，主要有三家：讲史、小说、说经。三家所讲，内容上各有侧重，艺术上各具特点，因此也各有各的发展轨迹和规律。“小说”一门，又分“烟粉”“灵怪”等八目，也各有特色，各有发展线索。“说话”的分门别类，不仅使宋元之市人小说门庭各异，后世通俗小说的分类，也肇端于此。

宋元的市人小说，不只是宋元小说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整个中国小说史上的辉煌篇章，是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闪光的一页。它的崛起，结束了主要由贵族、地主、士大夫创作，也主要为他们服务的雅小说的一统局面，反映了小说创作由作者、服务对象

不同而引起的写作目的、作品思想内容、艺术格局、语言因素等重大变迁，带来了审美习惯的巨大革新。它的发展壮大，规定着此后中国小说主流的发展方向，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又完成了一个新的飞跃。